

新婚姻法从1981年1月1日起实施 国务院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国务院新近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新婚姻法。

通知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将从198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和有关方面积极配合，统筹安排，在新婚姻法实施前后集中一段时间，广泛深入地展开一次

宣传活动。

通知说，各地在处理有关婚姻家庭问题时，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能随意变动。前一段时期，有些地方在婚姻、离婚登记办法等方面各自做

过一些暂行规定，自新婚姻法实施之日起，凡与该法不一致的有关规定，一律无效。

通知要求，各级政府的干部都要模范地执行婚姻法。尤其是司法、民政部门的干部，更要奉公守法，认真学习和掌握新婚姻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事，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惩办违法乱纪分子，伸张正义，为贯彻新婚姻法做出贡献。

抚顺市东三路副食品商店加强物价管理

居民代表检查商店执行物价政策

据新华社沈阳12月15日电 抚顺市东三路副食品商店，吸收街道居民代表参加组成物价管理委员会，认真检查本店物价，对违反物价政策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受到群众称赞。

有一次，值班经理和物价员抽查卖肉组执行物价政策的情况时，发现在卖出的8磅猪肉中，有3份斤两不足。又一次抽查蔬菜组，发现营业员把5角1分1斤的蒜苗，每斤多卖了4分钱。当场向顾客赔礼道歉，并补货、退款。

为了严肃物价纪律，商店扣发了这两个营业员的当月奖金。对一个情节比较严重的营业员，还撤销了他的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这家商店的物价管理委员会，还经常开展评议店活动，听取群众对物价的意见。在日常营业中，每天都有一个经理或副经理带领物价员对柜台营业进行监督检查，接待来访顾客。

长春开展群众性物价监督活动

本报讯 据《吉林日报》报道：长春市建立了义务物价检查员制度，开展群众性物价监督活动。

今年8月以来，长春市共发展了278名义务物价检查员。他们持有市人民政府发给的物价检查证，对市场价有质询、有权检查，有权批评，有权向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市委党校义务物价检查员邹立新，利用业余时间，检查了5个国营、集体企业和8个街头售货亭、私人摊床，共检查衡器13台，对其中七台失准秤，分别做了处理。市总工会义务物价检查员隋锡久深入市场检查物价。一次，发现一个蔬菜供应点把质量好的大葱留在内部职工中，把质量差的卖给群众。隋锡久当场对这个营业员进行了批评，使这个营业员认识了

错误，把好葱拿出来卖给群众。市商业局义务物价检查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铁北副食品商店山门市部、民主门市部，宽城区胜利副食品商店黄河门市部、天光门市部等单位，把三级酱油提为二级价格出售的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没收这些单位的非法收入，对有关责任者进行罚款、取消奖金、批评教育等。

市总工会为了充分发挥义务物价检查员的监督作用，最近召开了经验交流会。

株洲电力机车厂重用没文凭“状元”

从工人中选拔2名技师和25名技术员

据新华社长沙12月16日电 湖南株洲电力机车厂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也重视从工人中选拔人材。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厂从工人中选拔了两名技师和25名技术员。工人们说：“没有文凭的‘状元’也得到了重用。”

组装机车间试运班班长吴志超，20多年来，坚持自学电工基础理论知识，熟悉机电电器性能，经他试验的一百多台电力机车，没有出过质量事故。去年下半年，他被提升为技师。担任技师后，他又试制成功了一台电力机车耐压试验机有关键设备。

技术员林锦铭原来是个钳工，1951年进厂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现在，他已自学完了全部初中课程和大部分高中课程。

在全军“红旗车驾驶员”观摩评比考核中，

程，还学过机械制图、机械工程学、材料力学等专业知识。近年来，他主持参加了1,200吨水压机等设备的设计，为电力机车专业生产作出了贡献。现在，他担任了全厂设备规划领导工作。

郎宇奇八十多个项目全获满分

新华社昆明12月16日电 人民解放军昆明部队某团汽车驾驶员郎宇奇，最近在全军“红旗车驾驶员”观摩评比考核中，80多个项目全获满分。

评比“红旗车驾驶员”是全年1978年开展起来的一种以爱车、守纪、安全、节约为主要内容的评比活动。在每年一次的评比中，给思想、作风和技术条件达到标准的优秀汽车驾驶员，授予“红旗车驾驶员”称号。郎宇奇勤奋学习

驾驶汽车，终于成为部队驾驶员中技术最好的人之一。他特别爱护车辆，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节约油料和机件，从不带着故障跑车。他开车在云南边防盘山绕岭的各种复杂险峻的公路上行驶了17万多公里，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节约汽油达7,800多公升，连年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这次考核中，不论上级考核人员提出什么问题，设置什么故障，他都迅速正确回答和及时进行了排除。

去。根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哪些要办，怎么办。认为传达了，事情就完了。这种机械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我们要坚决废除。这种封建性的个人迷信，必然把我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造成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这样一来，不负责任就出来了，创造性就没有了。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推、等、靠，大都是这样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时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们把它扫了一下，思想解放了。以后这个东西又复活了。这几年扫了扫，但是不少地方还继续盛行。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这种恶劣的风气纠正过来。不然，什么朝气蓬勃的创造性，都起来不了。

第二，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工作

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也确实不容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两种：当我们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的时候，就可以多少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背离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多多少少延缓或阻挡历史的前进。

我们不能把个人放在人民群众之上，不能把个人置于历史规律之外。个人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的。为什么号召打倒“刘邓司令部”，十年还打倒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的纪律。为什么“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就是因为他们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孤家寡人，摧枯拉朽，一发一炮，就被打倒了。“四人帮”祸国殃民，不得人心，早已是空架子。他们罪恶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人民早已起来作斗争了。天安门事件就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下转第四版)

全部织成布全国平均每人可得三米

今年化纤生产可达四十二万吨

据新华社上海12月16日电 12月14日在上海结束的全国化纤工业生产经验交流会提出：要切实解决好我国10亿人口的穿衣问题，必须在抓好天然纤维生产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化学纤维的生产。明年发展化学纤维生产的重点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这个会是纺织工业部主持召开的。会上提供的情况表明，近几年我国化学纤维生产发展较快。1978年全国化学纤维产量为287,000吨。今年预计到年底可达42万吨，比前年增加46%以上。这些化学纤维如果全部用来生产化纤布，全国平均每人可以得到3米，比前年增加1米。但与人民生活需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是花色品种比较单调，化纤织品的价格也比较高。因此，必须从提高质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增加品种方面下功夫，努力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

参加会议的代表谈到，当前我国经济建设重点已转移到发展轻纺工业上来，这为化纤生产创造了条件。但化纤行业也必须贯彻调整方针，立足于现有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减少石油、天然气的消耗，从提高质量和降低消耗中求增产。全国现有化纤企业140多个。这批企业近几年生产发展较快，但是很不平衡。有些企业能源、原材料消耗较高，产量低，质量也较差；有的企业还有亏损。为此，会上介绍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腈纶厂等一些先进单位先进管理经验，要求与会代表把先进经验带回去，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挖掘出新的增产潜力。

会议还要求各有关地区、有关部门对不下马的在建工程，要尽快组织协作配套，抓紧扫尾工作，争取明年内投产。对已经投产，但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国产维纶厂，也要抓紧解决供电不足、不正常等问题，使这些企业能正常生产。

纺织工业提前完成年生产计划 利润比上年增长27%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记者从纺织工业部获悉：我国棉布、棉纱、化纤、呢绒、毛线、丝绸等九大类主要纺织品，已分别提前一个多月至两个月完成全年生产计划。今年全国纺织工业的利润，可比去年增长27%，成为我国工业行业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部门。

今年棉花等原料不够充裕，各地纺织工业部门积极调整原料结构和产品结构，从高质量、多品种方面下功夫，增产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一些纺织厂用化纤纤维织造腈纶簇绒毯和滚珠毛毯，生产化纤针织外衣、衬衣、裙子、弹力衫、翻领衫等。这些产品由于穿着舒适、美观、耐穿耐用，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各地纺织厂还积极改进工艺和设备，增加中、高档产品的比重，生产了精梳高支纱织品，宽幅织物，混纺织物，以及防皱、防皱的新品种。据上海、江苏、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湖北、浙江、黑龙江等省、市的不完全统计，今年投产的新花色新品种共有三万个以上。丝绸被面、毛毯、腈纶产品、涤纶弹力呢等短纤产品的产量也有增加。

黑龙江山调整采掘比例

提前完成原煤生产和开拓掘进年计划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6日电 黑龙江省统配煤矿经过调整采掘比例关系，生产逐步转向主动，分别提前16天和51天超额完成了今年原煤生产和开拓掘进计划。商品煤含矸、洗精煤灰分、坑木消耗等项经济技术指标也都完成得比较好。

黑龙江省是我国主要产煤省份之一。前些年省内各统配煤矿由于普遍存在着重采煤、轻掘进的现象，造成了采掘比例的严重失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各煤矿今年把调整采掘关系作为工作的重点，配备得力的领导干部，组成了强有力的掘进指挥系统。各矿还把当前的调整工作同长远规划的安排结合起来。对二十世纪内生产可望增长的矿井，通过技术改造，提高薄弱环节的生产能力，以保证生产持续增长；对本世纪内能维持现有生产能力的矿井，通过延深井，使生产保持现有水平或稍有增长；对衰老矿井，则采取措施，尽量推迟其衰老期。

黑龙江省统配煤矿今年新增了一千九百多名工人。各矿把这批工人全部充实到新建的87个掘进队里去，加强了掘进力量。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今天出版的《红旗》杂志1980年第24期，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全文如下：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对我们广大干部、特别是做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报刊工作的干部，是一个根本的要求。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讲过，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

以往的实践反复证明，是搞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对于我们许多同志来说，并没有解决好。有些同志本来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唯物主义，搞唯心主义，犯了错误。有些同志主观上想搞唯物主义，实际上还是滑向了唯心主义。

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一定要走到脱离唯物主义。

这里，想从五个方面谈谈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问题。

第一，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对待上级的指示

对上级的指示态度不正确，往往是我们离开唯物主义、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方面。

什么是上级呢？有上级组织，上级机关，上级部门，上级负责人。这些概念有联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当党内生活不健全的时候，以个人代替组织，个人代替党委，就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所以，不能把上级负责人个人同上级组织等，不能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必须坚决奉行的东西。当然，在某个时候，在一定的情况下，党委没讨论，没做决定，他个人发现得很好，并提出了很好、很精辟的意见，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但是，一般地说，经过大家讨论的意见，总是胜于个人的意见，集体的智慧总是超过个人的智慧。所以，把上级负责人个人的意见就当作上级的决定、指示，这是不妥当的。

上级的东西要不要执行？当然要执行。但是，各级党委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如果不把中央、上级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加以具体化，满足于照抄、照转、照搬、照套，就是错误的，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因为中央是从全国的一般情况出发的，只能讲一般的原则。中央、上级也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把一切都安排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情况非常复杂，事物在不断地发展，中央不可能把一切问题都想得很周密。所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对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补充；中央没有问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同时，该集中的要集中，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否则，各行其事，上级和中央一点不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对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可以补充；中央没有问的，地方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所说的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地方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

都需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同时，该集中的要集中，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否则，各行其事，上级和中央一点不知道，那也是会出问题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这才叫做按唯物主义办事。

知道，那也是会出问题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上级的指示，这才叫做按唯物主义办事。

上级可不可以犯错误？中央可不可以犯错误？中央的负责同志可不可以犯错误？都有可能。中央的决定、中央的文件、中央同志的意见，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错误。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的负责同志就开始离开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犯了错误。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迷信，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教皇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那搞了一段个人迷信。危害之烈，莫此为大。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个人迷信这种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能力大小强弱之分，没有绝对行行绝对对不行之分。不能说这个人的能力绝对行，那个人的能力绝对不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地方几乎形成了一种习惯，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不能掉，要一层一层传达

克山县黎明大队在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

## 实行专业化生产合同制农工副全面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李天星、章武厚，记者景博报道：黑龙江省克山县北联公社黎明大队，在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突破生产队的经营范围，实行由大队统一领导的专业化生产合同责任制，彻底改变了在劳动管理上干“大混工”，在劳动报酬上吃“大锅饭”的现象，促进了农工副各业的全面发展。

去年，这个大队在基本实现了田间耕作和非田间作业机械化后，直接参加种地的劳力，不到劳力总数的五分之一。于是，他们在劳动管理上以大队为单位，把农机和积肥人员组成一个农业专业队，把剩余的百分之四的劳力按照各人的技术特长，分别组成工业、畜牧、多种经营、建筑、后勤服务五个专业队，各专业队又分设若干专业组。他们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广开生产门路，发展人参、黄皮、木耳、果园等种植业；发展牛、羊、猪、禽、鹿、柞蚕等养殖业；发展米面、食品、淀粉、制油、制瓦、绣花、皮革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在劳动报酬上，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别实行定额包奖合同、包工计件、计时评议、技术附加四种形式。这一年，全大队的粮豆总产达到392万斤，比上年增长8.4%，生产费用下降7%，交售商品粮230万斤，超过定购任务4倍；工业收入35万元，比上年增长70%；人均收入298元，比上年增长36%。

今年，黎明大队通过分析比较，确定全面推行专业化生产合同责任制。具体的做法是：根据各专业队、组的生产条件、设备能力、劳力状况、技术水平、经营基础，年初分别确定全年的产量、产值、费用、利润四项指标，综合计算净收入，又按预计的净收入确定每一个标准工日的工分定额，然后按完成定额多少计算劳动报酬。各专业队、组对社员个人则分别实行定额计酬、包工计件等计酬形式。

合同制起了很好的作用。首先把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了实处，各专业队、组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争取最佳的经济效益。皮草组今年合同确定产值4,400元，费用4,000元，利润4,000元，以净收入的5.50元为一个标准工日计酬。这个组为了实现超额生产，主动改革旧的制作方法，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皮张综合利用；加强经营管理，多方提高劳动效率。现在，全组的产值达到7.070元，节约费用

100元，比合同定额增长60%，一个标准工日值超过原计划的48%，全组每人平均分得劳动报酬915元。

其次，合同制把专业化生产责任引导到企业管理的轨道，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能力，克服了生产的盲目性。今年，他们立足于本队，着眼于市场需要，调整了多种经营项目，停办了产品不对路的罐头厂；对产品虽有出路，但质量低的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使面包、饼干等产品的成本降低，质量提高，销路越来越好，利润越来越多。

合同制还促进社员学习专业化学术技术和管理本领。大队办起了三个农工副专业技术学习班和一个农民夜校。现在已培训干部、社员410名，其中有30人被大队任命为所在专业队的技术员。

目前，全大队签订生产合同的30个专业队、组，有27个超额完成生产合同规定的指标，全大队农业持续丰收，工业收入上升到43万元。

## 用经济合同落实经济责任



短评

克山县黎明大队实行专业化生产合同责任制，用经济合同方式确定和落实大队与专业队、组彼此应承担的经济责任。这是用经济手段处理集体经济内部生产和分配关系的一项革新。

专业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趋势。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单位，在突破“小而全”自给自足经济局限，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有较高的商品率，有大批剩余劳动力的时候，实行全面的专业分工就有了可能和必要。请看黎明大队，在粮食生产基本实现田间作业和非田间作业的机械化以后，腾出

的劳动力有五分之四之多，所产的粮食绰绰有余。这就为林牧工副各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力、口粮、饲料、资金等条件。这时，他们因势利导，实行专业分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既能避免浪费的窝工浪费，又有利于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进一步发挥生产力的技术特长，是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改进。但是，要采取相适应的劳动分工形式，切实保证劳动者的利益不断增进，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才能发挥其优越作用。所以，劳动管理和劳动分工的改进要通盘考虑，使之互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林业研究所造林研究室主任工程师蔡壮飞（右）在测量风沙林带的树高和树的胸径。

新华社记者 陆金发摄

相适应，让集体与社员个人之间都承担明确的经济责任。一般生产单位实行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有奖有罚责任制，就体现了这样的要求。实现了机械化的黎明大队，突破了生产队的范围，以专业队、组为经营单位，怎样实行大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呢？签订经济合同，确立大队和专业队、组之间的经济责任，把专业化分工的各项责任制落到了实处。这就较好地使劳动管理和劳动分工统一起来了。

黎明大队从实际出发，用经济合同处理集体经济内部的关系，是集体经济单位实行企业管理的一种尝试，符合农业现代化的方向。这件事也启发我们，形势的发展要求不断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进农村经济工作。

## 林木多头经营后患无穷

乱砍滥伐，破坏森林的现象在我们川溪县十分严重。一些国家单位多头经营林木，是引起乱砍滥伐的重要原因。今年10月18日，大塘公社供销社以“扩大业务范围，完成收购计划，搞活经济”为理由，打着收购煤炭的招牌，无视森林法规，不经批准，擅自在大塘公社供销社设收购点，大肆收购国家规定范围的规格木材。从10月18日到24日的六天半时间里，就收购木柴11,040斤，规格木材100立方米左右，而且收购的90%以上都是从山上砍来的新鲜木材。由于他们收购时抬高价格，把林业部门规定的规格木材价由每立方米41元抬高到90元以上，把烧柴由市场交易价每斤二分

加强调查研究 搞好经济分析

## 盖县农业生产灾年仍获丰收

本报讯 记者赵连宏、通讯员高地报道：今年辽宁盖县旱、雹、风灾害严重，由于县领导注重调查研究，搞好经济分析，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力求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农业生产仍获得丰收。全县农业人口人均收入160元，比丰收的去年增加19.4%。

今年年初，盖县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同志就今年如何起步的问题，进行了第一次经济分析。1979年，全县的粮食生产虽然还有潜力，但潜力有限；全县的林业是以机械加工为基础，有些不能大力发展，而且需要调整压缩。县委和县人委提出要抓好种植业和养殖业，尤其是发挥盖县苹果生产的优势。

干部社员认为这符合实际，各社、队和农场积极落实增产增收的计划和措施。不料，盖县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春旱，一些干部、群众产生了消极情绪。县里的领导深入社队，调查研究，于6

按自然规律治盐碱 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 新疆29农场粮棉连年获好收成

各生产环节制定技术措施，去年还进行了水稻飞机播种试验，今年飞机播种1,200亩，还用飞机进行化学除草，眼前这块田就是飞机播种的，预计亩产可超一千多斤。

1963年，这里的人们还没有认识治理盐碱的规律，只挖了灌渠渠道，不注意挖排水渠，使土地的盐渍化没得到治理。碱害使一些条田几乎绝产，给农场连年亏损。于是他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组织技术人员对土壤进行了普查，研究分析了盐渍运动的基本规律，认识到原先规划的条田过于大。要降低土壤含盐量必须改筑条田，增挖排水渠，平整土地，扩种水稻洗碱。经过8年的时间，共挖大小渠道1,000多条，总长1,800多公里，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最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全国第一次林业经济理论讨论会。这次会议紧紧围绕森林生态经济、林业管理体制和结构、林业所有制以及如何实现中国的林业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森林生态经济问题，着重提出了森林在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中的重要作用。代表们大声疾呼，我国森林当前正遭受着建国以来的又一次大破坏，并摆出大量破坏森林、乱砍滥伐的事例，分析原因，提出了制止森林破坏的建议。代表们指出：这样摆在眉睫的问题，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充分注意，不然的话，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与会代表认为，造成森林大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林业生产与自然生态和其他经济的密切关系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对森林只看到提供木材的作用，没能认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平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对所占的重要地位。代表们建议：要建立森林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学科。

## 迅速制止破坏森林按客观规律建设林业

全国第一次林业经济理论讨论会探讨发展林业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改革现行的林业管理体制和结构问题，大家认为，我国现行的林业管理体制不合理，也是造成森林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林业多头经营，各自为政，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办法，不讲经济效益。在林业内部长期实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经营方针，势必造成重采轻造，采多于造，这是多年来林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代表们认为，改革林业管理体制，对营林要实行企业化经营，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有效地保证森林资源的扩大再生产。

会议还讨论了林业所有制问题。与会同志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国有林、集体林和私有林三种所有制。长期以来，由于林权不稳定，造成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处理林权纠纷，稳定林权。

林业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林业现代化的标志，有的同志提出应以森林覆盖率、林木生长率、劳动生产率、森林资源利用率、林业技术装备率等为标准。有的同志认为，指标不宜过多，只要能体现数量和质量的森林覆盖率率、林木生长率就可以了。林业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到森林的多种效益，及其在维持生态平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厘抬高到三分，使附近的官屋基、九渡、水源、海洋等9个大队的群众，曾一度停止抢种、抢收，每天平均有六百多人上山突击砍伐木材。22日晚上，官屋基二队的社员去偷砍一队的树，一队护林员还开了枪。有的社员见收购人员只顾生钱，不问木材来源，不分干、湿、大、小，见材就收，连过路的桥木也拆去卖了。

社员群众对大塘供销社无视森林法规，私设收购点，造成严重恶果极不满，强烈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制止私设木材收购点，刹住歪风，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湖北利川县 人民检察院 辛海涛

## 王淑兰家庭养鸡再介绍

今年6月2日本报三版刊载了哈尔滨市退休工人王淑兰发展家庭机械化养鸡的报道以后，收到数百件读者来信询问有关舍、饲料等问题。现摘编今年第13期《半月谈》刊登的《王淑兰家庭养鸡场的再介绍》作为答复。编者

王淑兰的养鸡设备分平养和笼养两种。王淑兰家房舍小，采用的叠层笼养是两列鸡笼，上下4层，每层16格。每个笼子长、高各50厘米，宽30厘米。笼内分上下两格，上边站4只鸡，下边有接粪板。多层笼养，鸡舍面积利用率高，冬季鸡舍温度高，鸡的热能损耗小；每只鸡的光照、吃食条件基本相同，有利于生长和产蛋的一致性。笼养，鸡的活动受限制，能节省饲料，落地饲料也可以重复利用。还有，鸡与鸡粪隔离，改善了鸡的卫生条件。

王淑兰养鸡的饲料配方：玉米50%，鱼粉5%，豆饼17%，其余部分是糠麸。此外还有三种添加剂。一种是矿物质，主要有钙、磷、锰、锌、铜、铁、钠、碘、镁等和含以上成份的矿物质化合物。第二种是维生素，主要有维生素A、D<sub>3</sub>、E、K、B<sub>6</sub>、B<sub>12</sub>、B<sub>2</sub>、B<sub>3</sub>、B<sub>5</sub>、B<sub>11</sub>、B<sub>12</sub>等。如果青饲料以胡萝卜为主，可以不加维生素A。第三种是抗菌素，有青霉素、链霉素等。

在较先进的养鸡场，每产1斤蛋，耗用4斤饲料；王淑兰的鸡，每产1斤蛋只耗用3斤8两。

王淑兰买进鸡雏的时间是在4月末5月初。这时，哈尔滨地区气温转暖，可节省鸡舍加温用料。鸡的4个月高产期恰在11月到次年2月份，正值市场需鸡蛋较多阶段。产蛋鸡什么时候淘汰，也很重要。鸡的产蛋率第2年比第一年低15%左右。如果鸡产蛋一年就全部淘汰，资金周转有困难。王淑兰的办法是：成鸡数在百只以下，全部淘汰更新；成鸡数在200至300只，更新75—80%。在当年鸡产蛋前一个月，对老鸡进行强制换羽，可保持老鸡产蛋率。

王淑兰十分注意饲料和药品的合理存库。鱼粉储存不超过半个月，豆饼和玉米面不超过25天，糠麸不超过40天，贝壳粉和维生素不超过60天。储存时间过长，既影响饲料、药品的质量，又占用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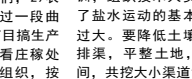
王淑兰第一年养250只鸡时，投资比例为：饲料近60%，固定资产占25%，雏鸡费占10%，电费占5%。



新疆刘集公社的社员在用棉饼喂猪。

本报讯 通讯员张宗平、记者刘瑞武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营29农场，是全国农垦系统先进单位。过去这是个戈壁滩，地势低洼，盐碱重的地区，加上气候条件差，雨雪少，风沙多，蒸发量大，解放前被一些人称之为“死亡之地”。经过29农场30年的艰苦奋斗，开拓了13万亩耕地，戈壁滩变为绿洲。从1963年扭转亏损以来，粮食产量每年以9.8%的速度递增。1980年粮食总产3,000多万斤，比去年净增365万斤；皮棉总产288万斤，比去年净增53万斤。

今年，这个农场又是一个丰收年。收获以前，我们来到这里采访，农场的同志告诉我们，29农场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生产水平，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农场的一位负责同志说：“盲目搞生产那阵子，看地处处惹人，种田讲科学，看庄稼处惹人。现在，我们健全了科研机构和组织，按



农村信箱

《工人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

# 努力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

本报讯 《工人日报》12月15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努力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

《工人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以来，我们的党风已有明显进步。不少同志以身作则，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注意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有些同志有时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也发生违背《准则》的事情，但一经发现，他们能够虚心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批评监督，认真改正错误。也有少数同志对人严，对己宽，口号喊得很响，却不身体力行，继续发生违反《准则》的行为。有的人甚至沾染了令人厌恶的腐朽作风。对别人的揭发批评，他们总是找种种理由来搪塞、反驳、推诿，有的人还利用职权，寻机报复。

文章指出：贯彻《准则》中出现的间题，就多数同志来说，主要反映到他们各自的党性锻炼和修养不同，遵守《准则》的自觉程度不同。怎样改变这种自觉性不高的状况呢？一要靠这些同志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二要靠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三要靠党组织的经常教育检查。

文章指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锋战士。这就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一定要努力养成甘为人民公仆、不做人民老爷的高尚品德。这是自觉执行《准则》的思想基础。有许多同志参加党，不是为了做官，为了给自己和家人谋私利，而是为了更好地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他们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都能把自己放在普通劳动者的位置，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真心实意地为民办好事，而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正因为他们不谋私利，不患得患失，才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敢于自我批评，敢于同各种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在物质生活上严格按制度办事。但是，也不能忽视确实有一些同志私心较重，在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的时

候，他们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滋长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常常把自己置于党纪国法的约束之外。对这些同志来说，要认真遵守《准则》，最重要的是去掉谋取私利的杂念，心里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努力提高做人民公仆的自觉性。

文章认为：鼓励和支持党内外群众开展自上而下的批评，对于促使党的干部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是十分必要的。要治好十年动乱给党的肌体造成的这种内伤，非加强党内外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不可，非有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可。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对于公开开展的群众批评没有某种担心。这有客观原因。“文化大革命”中，提倡用“民主”的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党的阴暗面”，结果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来乱党乱国，篡党夺权，打击和迫害了一大批干部。这个惨痛教训，应当深刻记取。我们今天强调鼓励和支持自上而下的批评和监督，决不是要重“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而是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指导下，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地使用批评的武器，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合乎分寸，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注意区分不同情况，合情合理地作出处理。现在人民群众渴望“四化”，寄希望于党的领导，严格要求党的干部，敢于批评干部的缺点错误和不正当之风，直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批评监督，这是好事，表现了他们爱护党、干部、关心党的事业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只能加以保护，不能挫伤；只能引导，不能压制。当然，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乘机制造混乱，甚至借批评干部的缺点全盘否定党的领导。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惊慌失措，只要引导得当，这类事情，也有助于我们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和训练干部，教育和训练群众。

文章指出：有了自上而下的批评监督，还必须有关组织的教育检查和监督，提高党员干部遵守《准

则》的自觉性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在有些部门和单位，对本部门特别是本单位领导干部中发生的问题，往往不主动解决，非要等到上级组织出面干预，领导同志亲自批示，或者拖到激怒了群众，激化了矛盾，才勉强地被动地去解决问题。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那里的领导干部打不开情面，只考虑顾全个人的“面子”，不考虑对党的影响；有的是受“一俊遮百丑”的旧观念影响，以为只要是好干部，有错误也要“包涵”；有的是怕牵扯的人多，捅了“马蜂窝”，惹不起；还有的是同病相怜，怕触动了别人，暴露了自己，搞官官相护。必须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帮助那里的党组织恢复活力，敢于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对那些蔑视党纪，敢于以不合法的人，不管是谁，都应当揭发，坚持不改的要给予党纪处分。对干部违反纪律的错误，通报批评，给以处分，并不是要把干部打倒搞臭，而是为了挽救本人，教育大家。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时期，党内党外的批评都搞得很不正常，至今给党留下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公开批评某个干部的某个错误，就意味着这个干部还有其他严重问题，就必然要罢他的官，把他打倒，以至在一些同志看来，只有“要打倒的人”才会公开批评，或者非等到错误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才去揭发，否则，就揭露不得，批评不得。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提倡及时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批评，做到防微杜渐。

《工人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最后说：执政党的党风好不好，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疏忽，或者把端正党风搞搞四化、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有害的。现在，我们端正党风的有利条件很多，只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继续努力，坚决维护党纪的严肃性，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促进党风的根本转变，是完全可能的。

天津一些大饭馆出现新气象

## 利用职权大吃大喝的人少了

从报纸上批评不正之风以来，天津一些大饭馆出现一种新情况，用公款请客、凭借职权受请而大吃大喝的人越来越少。

据天津塘沽桥、登瀛楼、狗不理馆的负责人介绍：一、长期以来，一些单位和个人常常把饭桌包下，招待他们有所求的领导干部或“关系户”，现在这种现象已不多见。二、经常出入这几家饭馆的掌理人、权力和物的人很少露面了。因吃请受賄、肆意搞不正之风的天津市规划局规划管理处副处长曹天士、掌握招工天津市规划局公用局劳资处副处长王士璋都已离职或停职检查。类似这样一些餐饮服务人员所熟悉的，一个近时期来，也已久违了。三、有些单位订了雅座，但是，要请的主宾却常常届时不到，弄得置办宴席的人欲吃不便，欲退不能，十分尴尬。

李元清 孟子君

## 学了《准则》就要照着做

——记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执行《准则》的事

从楚雄开往南华县的长途汽车上坐着几位解放军战士，其中一位已经鬓发花白，他就是云南省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

陈仁才这次是到南华县武装部检查工作的。临出发前，警卫员小吴问他说：“司令员，你要坐几号小车，我去叫管理科派。”陈仁才回答说：“去南华的公共汽车很方便，你去买几张车票，咱们就坐公共汽车去！”这样，陈仁才就和战士一起出现在楚雄去南华的公共汽车里。

到了县武装部，陈仁才一直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7月31日清晨，工作完毕，准备回程。武装部的同志挽留说：“我们今天下午会餐，庆祝‘八一’建军节，司令员和我们会餐再走吧！”陈仁才说：“嘛嘛！”武装部的同志又提出把会餐时间提前到中

## 李之亭冤案平反为何这样难

编者按：为李之亭同志的冤案平反为什么这么难，主要是因为制造冤案、现在仍在台上的人软拖硬顶。大量事实表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迟平反不如早平反，拖泥带水不如干脆利落。那些至今对某些冤假错案仍然软拖硬顶的地方和单位，不要再拖下去、顶下去了。

十年浩劫，惨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迫害的同志，当接到组织上的平反决定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可是，李之亭同志每次接到山东省和青岛市委平反决定时，却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为什么？

李之亭，“文化革命”前任青岛市委市南区宣传部长、副区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反革命行径进行了抵制。1967年，康生指使王效禹在青岛制造的“1.22”反革命夺权，李之亭坚决反对，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关牛棚。1970年，王效禹垮台了，李之亭解放了，他由群众推荐，被结合为市南区革委会副主任。当上级指名要选康生的儿子为十大代表时，李之亭表示反对。因此，青岛市委于1974年5月决定李停职检查。1975年3月，王洪文批示海军赵奉庵同志反康生一案涉及李之亭，因赵、李在一起议论过“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引起了全国武斗”，“康生支持王效禹和康的儿子搞乱了山东”，这还得了，都是“反革命”啊！1975年10月，省委主要负责人决定对李之亭立案审查。

粉碎了“四人帮”，理应给李之亭平反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那“反康生就是反革命”的倩东，还在起作用。1976年12月18日，山东省委写出报告，竟认为“李之亭等人接受和传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政治谣言，实属严重违法乱纪”。这还不算，到1977年11月，青岛市委市南区委写出报告，说李犯了接受、传布、搜集反革命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指康生）等错误，要求市委办李之亭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当时市委负责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要了个花招，写了不下隔正式文件，而用电话通知决定将李隔离。1978年7月，从北京来了一位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他听了青岛市委主要负责人汇报李之亭攻击康生言论后，指示：“李之亭的问题还要继续查清。”这一下，市委更主动了，加派岗哨，对李严加看守。李之亭和他的爱人张茜没有被打倒，他们冲破重重封锁给党中央、最高人民法拍了电报，还继续给中纪委和中组部写了申诉材料，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督促下，1979年1月4日李之亭同志才被解除关押。

李之亭虽然恢复人身自由了，但对他的平反却一拖再拖。本来，最高人民法院于1978年12月21日发出通知：“对因反对康生而以反革命罪判刑的案件应一律平反”，但山东省委拖了近4个月，由省纪委给李之亭等人做出一个有关海军赵奉庵反康生一案的平反决定。但市委对李之亭一案却迟迟不予平反。1979年7月，中组部几位同志根据中央领导批示到青岛调查，认为李之亭是影射攻击康生的，应予平反。他们和市委领导交换意见，提出平反要干脆，要把平反决定中的派性尾巴去掉，市委领导当面答应。谁知中组部的同志走后，市委对李之亭同志的平反拖了近5个月才印出一个决定。李之亭一看，决定中却写上什么：“李之亭同志虽有派性错误，但属于总结教训教训的当事人”，李之亭十分气愤，当然不能接受。他质问市委领导：“你们为什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难道清查中非法关押我401天是对的么？”市委秘书长刘笑咏昧着良心说：“这只是文字上绕个弯，不影响平反。”其实，这个“尾巴”有奥妙，因为在清查中，青岛市委偏离了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错误地提出清查是一个“体系三股势力”，实际上是整了反康生、反王效禹的干部和分子，李之亭是一个被整的代表人物，给李留个尾巴，就可以“证明”市委是正确的。所以，市委不顾李之亭的一再反对，坚持在平反决定中加上派性的“尾巴”。

今年8月，中纪委调查组到青岛，指出市委主要领导人李之亭平反软拖硬顶的错误，并希望他们作自我批评，尽快给李之亭落实政策。青岛市委勉强于9月17日做出平反决定。但是，市委对李之亭的平反工作很不严肃，很不认真，不少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比如，应该给李之亭在适当范围开个平反会，但一个会也没有开，平反决定是市南区交通员送去的。在市南区因李之亭反康生冤案株连的干部至今没有彻底平反等等。因此，李之亭同志认为理不通，气不顺，他连续两次给市委主要领导人写信申诉意见，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李之亭平反为何这么难，阻力主要来自制造冤案的、现在又在台上的人。原青岛市委书记、现任山东省副省长的那位同志，说李之亭时劲大得很；市纪委一位副书记是办李之亭反康生案的领导者的，给李之亭的平反怎能到痛痛快快的呢？加上干部中的派性，所以有人千方百计地软拖硬顶，最后当被迫不得不宣布平反时又草率从事，对有关问题不作妥善处理。

《光明日报》记者 肖黎 本报记者 段存章



上海手套一厂青年女工朱静芳，经过5年刻苦自学，已能独自负责全厂7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维修和程序编制工作。她还和厂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改建了两个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车间。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撰

## 关于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问题，

为什么允许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

新婚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这项重要规定，是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民族政策的。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许多民族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只要这些风俗习惯不违背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受到尊重。所以，新婚姻法规定，允许民族自治地方作一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根据我国宪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有此权限的。这样做，有利于新婚姻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执行。

（原载《中国妇女》增刊《婚姻》）

## 泛起的市侩哲学

余耀中

现在，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惹不起的‘关系户’，学不完的‘关系学’”。

“关系户”所以惹不起，因为有权有势。稍一怠慢，轻则刁难，重则断绝“关系”，弄得你困难重重，不成办事！所以有些单位为避免麻烦，对“关系户”又是“烧香”，又是“许愿”，而把党的纪律、纪律抛在一边。这种所谓“关系户”，实际上是私下交易、变相贿赂的代名词。

“关系户”有两副面孔：“关系”好时笑着脸，又肯“帮忙”；又“出力”；一旦怠慢了他，他就板起脸，又是“制度”又是“规定”，袖手一甩不认人。

谈到“关系户”，当然不能不提到所谓“关系学”。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学政治，学科学，不如学点‘关系学’”。

## 反对借出国之机捞油水

当前出国之风甚行，过去的“古训”，“格言”对他们不起作用。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对他们不起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党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制度，严格党纪国法，不能允许这种现象存在，更不能道德败坏的人，过去的“古训”，“格言”对他们不起作用。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对他们不起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党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制度，严格党纪国法，不能允许这种现象存在，更不能

## 书记这样搞，党风怎能好

《准则》公布快一年了，某些领导干部仍置若罔闻，明知故犯。河南省教卫委副书记李政就是一例。

李政是主管文教卫生工作的，他利用职权搞不正之风，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份，许昌市曲剧团到该院演出，他要请副院领导和与他故交的一个主要演员。该院县委有规定，请客拿钱，李政却利用职权，让卫生局报销了。由于他的热情招待，剧团每场都送给他一些招待票，演出五场，共送招待票130张，折价39元。

由于领导带头搞不正之风，该院副院的干部也上行下效，滥发“招待票”。最近，根据群众强烈要求，县委宣传部和县文教局派人到该院进行调查。李政得知后，亲临该院，质问调查组的同志：“谁让你查副院招待票的，什么意思？”书记如此蛮横干涉，调查组只好收兵。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搞好党风何等不易。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搞不正之风，可是李政这些人仍然置若罔闻。

据郾城县委纪委筹备组来函称，李政同志已作了检讨，并退出了用公款请客和招待戏票款55元。

——编者



三思而后行

（原载《贵阳晚报》）



本报讯 今年，我国运动员在国内外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表现了良好道德作风，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了表彰他们当中一批最优秀者，激励运动员们勇攀运动成绩高峰，为加速发展体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体育报联合举办评选1980年10名最佳运动员。

去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和体育报联合举办评选最佳运动员的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出现了十分踊跃，收到选票近十万张，进行了全票评选全校评选以及为“十佳”献诗、

首都十个新闻单位联合举办

评选1980年我国十名最佳运动员

设有“评选奖” 选票统一发售

作画、赠纪念品等许多动人事迹，给运动员极大鼓舞。

今年，为了做到既鼓励参加者认真搞好评选，又为国家节约开支，举办单位采取群众意见和建议，采取新的评选办法：即参加者必须购买统一制订的选票，按要求进行评选。每张票价1角（邮资总付）。获得选票最多的前10名运动员当选。被评选上的最佳运动员，举办单位除在报章、电台和电视台宣传介绍他们的事迹外，还将赠送纪念品和奖品。

这次评选活动还设有“评选奖”，选中

纪念品一件；获二三等奖者每人可得价值10元的纪念品一件；获三等奖者每人可得价值5元的纪念品一件。“评选奖”将在运动员评选结果产生之后，从选中最佳运动员最多的评选人中产生。如果中奖人数超过或不足设奖定额，则由举办单位采取抽查办法产生或递补。评选票数量有限，本月25日前后将在一些大、中城市体育部门陆续出售（不办理函购）。

评选活动自即日起开始，1981年1月10日截止（以邮戳日期为准），1月下旬公布评选结果。

北京邮电医院不再接待外地精神病患者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据北京邮电医院来信称，8月17日新华社播发《王栋桥自学成医，治疗精神病》的报道后，全国各地许多精神病患者，在亲属陪同下，纷纷来北京找到该院，要求王栋桥同志治疗。北京邮电医院是邮电系统的职工医院，无力接待外地患者。按照卫生部规定，“精神病患者应在本地就医”，北京邮电医院不再接待外地精神病患者。

更正 本报12月5日第三版《养莽豺狼的人》一文中的“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应改为“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

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政协礼堂开幕。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开幕词。他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开幕了。我们佛教界人士及其千百万信徒在经历了十年的空前浩劫之后，今天能够高举爱国旗帜，共同进步、致力祖国的建设，深感自豪。

他说，我们佛教按照千百万各族佛教信徒的愿望，肩负重建法幢，发展佛教，促进安定，加强团结，爱国爱教，建设四化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团结教育广大的信徒爱国守法，在祖国建设四化的新形势下，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他在开幕词中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佛教徒和海外同胞以及其他宗教徒之间的联系，为反对霸权主义，制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努力。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在

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佛教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对全国范围内重点寺庙的恢复整修进行了各方面的协助。同时，恢复了中国佛学院，搜集、整理佛教经典和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工作。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正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修改草案）并作了说明。

会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张杰代表其他宗教团体致了贺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宣读了日本佛教界和其他友好团体和人士的贺电。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佛教徒，包括汉、藏、蒙古、傣、满、土、裕固、纳西等8个民族和全国不同宗派的代表，共二百五十多人。出席会议的有关方面代表和负责人有帕巴拉·格列朗杰、张执一、肖岗法、巨赞、嘉木样等。

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代表团离京回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以中央总书记比斯库斯·德拉科普洛斯为团长的希腊共产党(国内派)代表团，结束了在我国为期16天的友好访问，今天下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在访问期间，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同德拉科普洛斯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

两党情况、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

杨静仁会见斯里兰卡司法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杨静仁今天下午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统的弟弟、斯里兰卡法律协会主席赫·威·贾亚瓦德纳和他的夫人以及由他率领的斯里兰卡司法代表团。

（上接第一版）所以，归根到底，粉碎“四人帮”的一举，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动表现。中央的同盟应党心民心，作出决策，粉碎了“四人帮”，减少了我们党的损失，是有功的。但是，这两者不能颠倒，颠倒了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错误的。必须看到，历史发展规律，人心所向，还是第一位的。

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相当混乱，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啊，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嘛，诸如此类的话，以后也不要说了。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受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的软弱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把自己看成无能力的为。对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翁。正由于我们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许多问题才搞得清楚。比如，人总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没有完人，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人。对每个同志来说，总是既有成绩和优点，也有错误和缺点。成绩、功劳有多少之分；缺点、错误有性质和大小之不同。但一点错误都不犯的人是不存在的。再如，成绩从哪里来的？主要是党的培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当然与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错误从哪里来的？人们在错误路线下会犯错误，在正确路线下也可能犯错误，这里总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每个人都有主动性的问题。我们要发挥主动性，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消极被动的。

还有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我们的工作经常有成绩也有错误，要不断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就一定要搞批评和自我批评。明明不对，硬要说对，明明不好，硬要说好，这怎么叫讲真话，怎么能总结经验呢？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要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国家里，大量的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往往可能发展为敌我矛盾。发展得对抗。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通讯《爱的力量》，讲的是两个要自杀的女孩子，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及时地、真诚地做了思想政治工作，最后挽救了她们。这个事例说明，只要它们做细致耐心的工作，就可以使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不至于激化起来，并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各部门之间，也有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采取激化的办法，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妥善地加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有些事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解决，但有的同志采取激化的办法，就往往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着重指出的，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纯化”一下，实行“冷处理”。常言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好处处的。根据历史经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不要躺倒不干；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击。如果相信自己是错的，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向不对的一方？如果自己觉得自己也有不对，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些不对的东西？我们是对的，人家反对了，推不倒；我们有点缺点，人家指出了，就认错，这就很好，就比较容易出现错误。所以，对待自己要经常坚持两分法，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使自己经常激化矛盾的责任。

第三，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

精神对待我们国家的大事

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建国以来，是轰轰烈烈的31年，还是乱七八糟的31年？是光明的31年，还是黑暗的31年？总的来说，从历史发展趋势来说，是轰轰烈烈的31年，是光明的31年。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新鲜事物。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诞生以来的时间还短，实践经验

还极其有限。第二，我们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国家很大。有的外国政治家就对我们说：你们十亿人口，按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不知道怎么办哩！这是真话。所以，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钱不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这一条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只能说，由于我们党内出了坏人，我们有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优越性。有优越性没有很好发挥出来和根本没有优越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1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主要是：第一，我们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第二，我们有了相当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两大条成绩，我们就有了前进的阵地。不能因为讲我们的错误，就把我们的成绩甩在一边。

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出现过严重危机。危机的顶峰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前。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结束了这个危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危机带来的后遗症。经济上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要采取有效的办法认真克服。因此，对经济工作、宣传工作，我们也要谨慎。总之，一个是要自己吓自己，一个是不要自己麻痹自己。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是能够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各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的。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工作量很大。我们要把国家搞好，基本上是两条。第一条，力求国民经济有稳步的上升，包括人民生活有适当改善，文教事业、科学事业有所发展。搞好这一条，就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明年要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真正遏遏，去掉盲目建设。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宣传部门，都要扎扎实实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条，政治上要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要继续努力消除一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安定团结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去办，或者一切都照原规矩办，那样也安定不了。要按照法律程序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斗争，要把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分子从领导岗位调开，来，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要研究和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发扬安定团结的积极因素，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什么是积极因素？例如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健全我们的民主生活，加强我们的法制等等。什么是消极因素？例如不正之风等等。当然，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要讲究领导艺术，分清轻重缓急，有正确的措施、步骤和方法。

第四，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

精神对待群众

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有的同志今天看一些出事情的材料，集中起来就以为很多很多。实际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与我们的总人口一对比，干坏事的、闹事的，那是极少数。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可是，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存在，但是也要看到，有些问题只是枝节，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这样我们就不会慌张。我们还要说，许多问题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做工作，或者处理不当，激化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们思想工作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不向群众做工作，不提高群众的思想，不引导群众前进，那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放弃了我們共产党人的职责。我

们的职责是改造社会，改造人，使人们的觉悟向更高的水平前进。

我们经常批评的官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只躲在房子里面办公，脱离群众。不动员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和我们的干部，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绪，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这一点，列宁讲过很多，毛泽东同志也讲过很多。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效地向群众做工作。我们做工作的着眼点，是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实现四化、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和英雄气概；同时，也要提倡舍己为公、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的社会制度为培养、形成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开辟了道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卢康我许是肯定有的。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已经没有了，还是没有，而且还可能滋长。但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少得不知多少倍。

我们要引导青年奋发图强，脚踏实地，为人民作出更多、更高的贡献。要防止青年人陷于目光短浅或者好高骛远的境地。人在青年时代，确有优点，也确有弱点。弱点往往是或者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或者目光短浅，小气小地。我们的宣传工作不要助长我们弱点的的发展。要发扬积极的的东西，奋发图强，舍己为公，朝气蓬勃地前进。我们现在在混乱反正，进行四化建设，在群众中和干部中有千千万万真真的动人的事迹。我们的思想理论界、报刊新闻界、文艺界，要多反映这方面的东西。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那种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动人事例来教育人民，这是最好的教材。这方面我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们要很好地重视知识分子，重视文教事业。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普遍缺少知识，而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密切不可分的。我们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还不够适当，对他们的许多实际困难，如住房、两地分居、工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现在我们有这些同志却，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过低了，他们翘尾巴了。可见，这个工作阻力很大。知识分子的头脑刚刚抬起来，有极少数同志又想把他们压下去。这就要向有关方面的同志做工作。多年来，在许多方面，我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是唯物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改变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克服歧视知识分子的残余思想。我们要下定决心，采取措施，非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可。

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小城镇，破烂不堪。云南的保山县是一个板桥公社，粮食高产，亩产1,700斤，确实是个好公社。板桥粮库前的600户中，有120户是从事手工业、服务行业的，很热闹。现在一看，差得多了。我们的国家，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主改革，后来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小城镇里的住户，有许多搞农业去了，很多小商店没有有了。现在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小城镇不恢复是不行的。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去，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不行。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了。城镇，首先要解决发展方向问题。要好好地搞集体所有制制，搞服务行业，搞手工业，搞饮食业。在思想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要来个5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些工作，都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扎扎实实地进行，不要一哄而起。在小城镇，照相馆、理发店、洗澡塘、娱乐场所一搞，治安也就好了。所以治安不能只懂得抓人，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面，发展教育文化娱乐事业，使青年人有事干，有书读，有地方玩。那样，社会就会繁荣安定。现在中小城市工作非常薄弱，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要搞试点，把小城镇的建设搞起来。

来 函 照 登

责报11月1日第三版刊登《屡教不改的帮派人物鲍岩象等被免去职务》的新闻报道和《把坚持派性的领导人撤下》的短评，我们认为有原则上的错误，特提出更正的意见。

鲍岩象、戴鑫潮两同

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10月由市委调任杭州轴承厂党委正、副书记的。在厂三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工作中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有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不能胜任现职，也不适宜在本厂继续工作。为此，我们对

他们的错误如向杭州市委反映，市委决定免去他佛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这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这同责报报道的“屡教不改的帮派人物鲍岩象等被免去职务”是有原则区别的。

中共浙江省杭州市机械工业局委员会

第五，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

精神对待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的命运同党的领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党的领导去谈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流砥柱。只有我们党能领导中华民族翻身。这是毫无疑义的。别的党都是都试过了吗？不行，国民党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有我们党能领导。总的讲，我们1,800万干部，3,800万党员，无论老干部、新干部，老党员、新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主要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党受到很大摧残，党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党员思想上的灰尘，比过去，比“文化大革命”前，比延安时期增多了。相当多的党员不合格，或者不完全合格，党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不看到这个方面是不对的，不是唯物主义的。党的威信不高，是现实的实际情况。因此，要堅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我们党的40年历史，经过两个阶段。28年搞民主革命，夺取政权；31年是执政党。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执政党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执政党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是理论上的，实践上也是说得通的。墨索里尼，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以后成为社会法西斯。中国也有，林彪、“四人帮”要把社会主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

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需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还有一条，就是坚决克服不正之风。克服不正之风，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不能动摇的。当然，这项工作会遇到很大阻力。纠正、克服不正之风，方向上要坚定不移，不能有什么错。在方法、步骤上是要认真研究的。鉴于不正之风在一个时期相当盛行，纠正不正之风，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以前发生的问题以后，除个别问题极大的，不要再重。《准则》公布以后，五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现在发生的问题，要认真对待，要从严。第二，对于不正之风，不管查到谁的头，都要核实。鉴于过去的教训，不要起哄，不要搞运动来搞，不要搞过火。往哪里核实？当然要通过所在机关、通过党委核实。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没有闹清楚之前，不要急忙忙下结论，以免误伤了好人。核实材料，要征求本单位意见，也要听取本人意见。第三，要抓重点。克服不正之风，是人人有责，级级有责的。纠正不正之风的问题，每个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提高坚定性。我们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一定要增强党性，不怕吃苦耐劳，有决心、有勇气，有办法去战胜我们身上的一切不正之风。

我们的党的绝大多数人是从小生产者出身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内存在不正之风的一个社会根源。农村、城市的小生产者，在民主革命时期，确有革命性，轻视这种革命性是错误的。但也有弱点，比如自私、保守、狭隘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在党内要克服小生产者的思想，共产党员要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气概、胸襟、眼光。我们同不正之风作斗争时，宣传、教育战线的重要同志从正面来启发，给广大党员以思想武器。要特别注重，党的历史上，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榜样是大量的，过去有，现在还有。我们确实有许多模范党员、模范干部。我们的报刊要多宣传这些东西，搞不正之风的人看了感到惭愧。我们我们一定要用正面形象来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鞭策落后者。

我们的方法主要是表扬，同时也要有批评。纠正不正之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各级党委、每个党员都要主动。我们党的每个细胞，都要毫无例外地为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每个党组织、每个党员的责任。

我和徐懋庸相识于1933年。当时我在左联工作。他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以他犀利的笔锋写了许多凌厉的杂文。我们交往较多。1934年初,我介绍他加入左联。1935年春,当文总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被捕以后,左联的组织一时解散,他继续积极努力地工作,我则通过他和鲁迅先生联系。当我离开上海到日本去之后,他接替了我在左联所担负的工作,同时保持了我们两人的通讯联系。

懋庸在上海联系鲁迅,我在东京联系郭沫若,在他们两人团结的基础上,广泛地团结了国内外广大的爱国作家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文艺界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后来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懋庸凭着鲁迅先生对他的爱护和信任,急不择言地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对某些事和某些人的看法,包括一些不够准确的想法,冒犯了鲁迅先生,加上鲁迅先生对他那封信的由来有所误会,他受到了鲁迅先生的严厉批评。有些人认为他从此一蹶不振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仍然发愤读书,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继续写作,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和徐懋庸先后到了延安。1938年,我们同任抗大工作,次年一同随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太行山区。从1938年到1942年,有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相处较多,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人真挚,善于思索,对于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活不一定顺耳,但仔细听取,余有好处;有的时候,见解有独到处,并且敢于指出别人不敢讲的话。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分手了,人隔两地,天各一方,音讯不通。然而,我们仍然怀念,从不忘记。

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消息传来,我感到震惊,感到痛苦。这是他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的开端,从此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到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他受到了严重的凌辱、折磨和虐待。虽然粉粹“四人帮”后,他根据革命精神,努力锻炼身体,胸襟开阔,对祖国对自己的前途非常乐观,终于还是未能免于过早逝世。言念及此,百感交集。懋庸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富有才华的忠诚干部,文艺界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闯将,痛哉惜哉!

## 二

懋庸的杂文,师承于鲁迅,他热爱鲁迅的作品,学习鲁迅的文章,特别是学习鲁迅的杂文,学得很好,很出色。连鲁迅先生的笔名、风格、笔调,他都学得很象,使一些人读了,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

懋庸很敬重鲁迅,以鲁迅为师;鲁迅对他很爱护,很器重,并且用笔名。当懋庸开始编《新语林》的时候,鲁迅劝他不要当编辑,以便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及至徐给以编辑以后,鲁迅又大力支持,并且对他多所指教。鲁迅对懋庸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这显然是对懋庸的一种赞许。

# 《徐懋庸杂文集》序

任白戈

鲁迅对懋庸的安危也是无微不至的。当他知道懋庸正患着消化不良时,亲自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给他,说“服了这药,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物,没有副作用的。”甚至他的孩子病了,懋庸都曾亲自给开药方。

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经过3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上半期,到80年代的现在,一直在继承,在发展;这条线一直没有断。而懋庸在30年代、50年代两个兴文盛时期,都表现了他的不平凡。对杂文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30年代,懋庸跟鲁迅站在一战线上,追随鲁迅写杂文。大家团结在鲁迅周围,把杂文当作匕首投枪,组成一条战线,造成一种声势,形成一股力量,共同向黑暗势力战斗。50年代中期,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重振旗鼓,又写了许多杂文。他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直抒胸臆,褒贬文坛,犹如异军突起。在那“不平凡的春天”,打开《人民日报》,署名“回春”、“弗先”……等的杂文,是何等的引人注目,曾引起过多大的反响啊!他写的《小品文的灾难》和《关于杂文的通讯》等文,为杂文的存在大喊大叫地争地位。他勤奋写作,几个月之内就写了100多篇30多万字的东西,为克服现实中的缺点错误,为杂文的生存和发展,为文坛的百花齐放,耗费了自己不少心血。万分可惜的是,他因此过早的逝逝所淹没,我们从此读不到他那尖锐成辣的文章了。我们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对于一个人民、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说来,本来是不应该支付的;而对于懋庸来说,更是十分沉重的。

## 三

懋庸的杂文,继承发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30年代,懋庸学习鲁迅不求形似,但求学实质。他跟鲁迅一样,首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代表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民党。例如《神曲的开头》,揭露了封建军阀的横征暴敛;《收复失地的悼词》,反了对国民党的不抗日,诸如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黑暗,他都有所揭露,都进行了讽刺。

他跟鲁迅一样,也对社会上的污七八糟的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凡是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包括思想、道德、作风,不管是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外部的、内部的、大的、小的,统统都成为他的杂文扫荡的对象。他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讽刺错误严肃热烈。

自然,他仍跟鲁迅一样,也歌颂友谊,赞美正义,张扬真理。

懋庸50年代写的杂文,发扬了30年代的战斗精神。他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不民主的作风、不

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这是他的精神之所在。

懋庸曾写过《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论文(未发表),从理论上阐述了教条主义的产生、表现、危害以及克服的办法。他又写了《过了时的纪念》,批判执迷于过时理论教条的错误,用今天的来说,就是反对思想僵化,反对照搬本本,把经验主义的理论看成僵死的教条,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总结经验,不结合实际,认为凡是上了书的,凡是大人物说过的就永远正确,一成不变。他说,实践证明,这是要误党误国的。

官僚主义,是懋庸杂文的主要批评对象。他用生动的语言,通俗的事例,勾勒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有我就是真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僚主义者,有“装腔作势、冷淡刻薄的官僚主义者”,有“心肠很好、不会办事、效率低微的‘诚诚恳恳的官僚主义’者”,如此等等。不管哪一种官僚主义,都对党的事业起着腐蚀破坏的作用,对社会对人民极为有害。揭露它,批评它,并向官僚主义者大喝一声,令其猛省,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热爱党的事业、心里装着人民痛苦的文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不要奴性》、《不要怕不民主》两篇文章,包含了辩证法。懋庸认为,对政党,对为官宦者,对执法掌权的人来说,要主动给人民以社会主义民主,更要怕人民要民主、有民主。人民有权,人民敢讲话,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都当阿斗,万马齐喑,任凭官僚主义者的主和摆布,国家必定衰败。另一方面,对人民群众来说,则不要怕当权者不民主,要敢于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他说:“官僚主义者既然没有……,不会自行消亡的”。这两篇东西,经过十年浩劫,今天重读它,顿觉意义倍增。

## 四

懋庸的杂文,有其独特的风格。用一句话来说明,可谓文如其人,他的艰苦生活和斗争历程所形成的思想、气质、品格、作风,就是他的杂文的源泉。

懋庸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上虞县,从小就喜爱文学,学习文章。但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做零活的手工工人,没有力量供他上进,所以小小毕大生,就去当小学教员。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宣传活动,编过过三上流。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遍布城乡,他不得不逃往上海,进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附中读书。读四年毕业后,他已能用法文讲话,在上海开始了大学生活。他翻译了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还译了巴比塞著的《斯大林传》及其它文学作品。他又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山川均的《社会主义讲话》及其它书籍。同时,他学习鲁迅的文章,开始写了一些杂文。从此,他步入了

各的解解。诚如王蒙同志所说,“各有各的对于真实性的理解”。至于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仅就真实性这一个问题上说)“是皆坐落到了劈了不两立的地步”,这要具体分析。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和雨果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为一方,一个主张再现“事实的真实”,一个侧重表现情感的真实;就创作方法而言,二者是相相当对立的。左拉的自然主义与近代西方盛行的许多现代派文艺之间的界线,也是十分鲜明的。前者描绘的是细节的真实,后者着意表现的是远景现实与与现实主义的幻、意识(不管是无意识或是下意识)意象的真实。但是,倘若就现代派文艺之中的各个流派来说,在真实性问题上倒是并非有多么大的分歧,虽然他们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各不相同。

面对着艺术上各执纷纭,莫衷一是的各种艺术家的说法,我们的文艺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真实呢?我还是恪守恩格斯提出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的思想。因为它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文艺规律本身的要求。我要补充的是,艺术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性问题,最好是联系马列主义和恩格斯的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来进行考察,否则就真会成为一个是非不清的闹剧。例如象本真真实性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光明面是主要的,因而也就是典型的、典型面是非本质的,也就是说是不科学的。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典型面是本质的反映,因此典型面是事物的本质的方面。因此,不管是对光明面的描写还是对阴暗面的揭露,都要写出各自不同的本质方面,只有这样,作品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同时,又能给人以希望。

打倒“四人帮”以来,我们打开了“窗子”,甚至“门子”,这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样一来,西方当代的文艺思潮就会通过各条渠道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涌来。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我们既反对盲目地一概排斥,同时也并不赞赏那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包括象反流、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新浪潮、反小说、荒诞派以及意识流等在内的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尽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它们在之间也有少共同的地方,例如它们在文艺的表述方式上相互比美避短、结构的破碎、语意的模糊、时序的颠倒、结构的破碎。西方现代文艺艺术所宣扬的真实性,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要的那种真实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扯清楚。

海的文坛,在我国现代革命文学史的篇章中,占有了醒目的一页。

懋庸出身贫寒,他生长在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同甘苦,所以他的文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他的杂文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主要原因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懋庸对于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于马列主义坚定不移,对于共产主义坚信不渝,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无限热爱。他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敢于冒风险,与错误开展斗争;为了洗刷玷染在党的肌体上的污垢,保持她的纯洁性,即使明知要受到来自背后的打击,他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

懋庸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不倦地写作,著译不计,总计达数百万字之多。他有较好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常运用辩证法于杂文。他常常从哲学入手,分析矛盾,紧紧抓住事物的实质和关键,不片面文章上浪费笔墨。如《规定的性质》、《真理归于谁掌》两次文章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是从哲学、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着笔的,他解剖了它的实质和性质,文字严谨,深入浅出,高于艺术手法。

不足之处是,懋庸对辩证法还不甚精通,思想方法带有片面性。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懋庸严于解剖自己是优点,但他要求别人、要求党都应当是十分全美的,则未免失之主观。他并不是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志没有成绩、没有优点,但他却认为这些成绩和优点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提到它;只有缺点错误,才是值得和必须着重提出、加以批评和力求改正的。所以,他在批评优点、评价工作的时候,就往往对缺点错误讲得过多,而对成绩优点讲得很少;或者是只讲缺点错误,不讲成绩优点。因此,虽然他的批评是出于内心的挚爱,是善意的,可是别人不一定能够感到,甚至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反感和不满意。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1973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我在北京两次住进阜外医院治疗,懋庸曾多次来看过我。初次见面,他向我倾诉了患病28年的种种情景,他非常感慨地说:“老任,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失去了笔端。不过,你是最了解我的,事实上我仍然是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虽然林彪、‘四人帮’给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头,我能够向前看。我的决心是好好学习提高,迎头赶上,把我现在的工作做好,并准备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他把他当时进行的工作和将来的计划说给我听。

象懋庸那样坚强的人,那样有理想有才华的人,不应该过早地离去,他应该活着,为新长征,为实现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计划和宿愿而活着。要是今天他还活着,且不说他和外国古典哲学方面,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方面——就是他当时正在做的工作,他将有著述贡献于学术和艺术界,并成就文学领域来说,他必定会有新著拿起笔来,继续写出许多情文并茂的新篇。

《徐懋庸杂文集》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们对序略作了删节。——编者)

# 文学流派与艺术真实

程代熙

王蒙同志在《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载《人民日报》8月27日第五版)一文中说:“我在探讨文学的真实性时,还应该注意各种文学流派。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印象派、象征派、超现实主义……各有各的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各有各的反映生活的路子。从广义上说来,我们是要坚持文学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望文生义地、轻率地否定其他流派和风格。我很怀疑各种流派是否坐落到了劈了不两立的地步。”这里我也该谈谈各种文学流派与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目的是想说明我们该怎么做。

西方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一是指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一是指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贺拉斯和朗吉努斯是古罗马古典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贺拉斯直接师承的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他要求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特儿”,但他并不排斥虚构。他说虚构“必须切近真实”,要“像假作真”,朗吉努斯在该文里说,“诗人作家的想象只有在能产生真实感时才算运用得最好”。单就贺拉斯和朗吉努斯的“真实说”而言,同后来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布瓦罗和勒内伏。布瓦罗也很强调文艺的真实性,他说:“只有真实才有美,只有真实才可爱;真实应该到处统治,谎言也不例外。”真实的反面就是虚假,“而虚假永远无聊乏味,令人生厌”。布瓦罗说的真实与亚里斯多德已经有所不同。后者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即按照规律或必然性所能发生的事”。而布瓦罗所说的真实指的是自然。他同样说:“自然就是真实。”不过,他所谓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中的事物,而是事物的性质。所以法国古典主义的另一个别名就叫做理性主义。法国古典主义文艺理论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崇尚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反对文艺直接反映现实生活(里奥莱的戏剧作品在这点上有所突破);(二)在人物性格性上表现为一种“定型论”。布瓦罗说:“写每个角色都要指着他的本性而言”,此乃后来还美的妙处说呢!每晚临开演,被用玫瑰露水调湿的儿童引到台前,此时一个戴着假面具的小孩引得发抖。一会儿把他成千条尾巴的畜群

况上下工夫。左拉在原则上排斥艺术想象,他认为想象必然导致描写上的失真。他要求的是“赤裸裸的真实”、“绝对的真实”。左拉的《金钱》揭露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利害关系和丑态,但偶就社会丑恶的本身来说,当时巴黎社会的现实比他所描写出来的还要丑恶得多,肮脏得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左拉过多地注重现实和细节的描写,这一点,连左拉本人也不否认。例如他说:“我的作品里,有一种真实主义的庞大症。从精确观察的踏板一跳,就跳到了星空。真实向上飞,就变成了象征。”就是说,现实向上飞,就失了头,结果反而失真。

与自然主义只重事实的真实相反,超现实主义不仅排斥事实,而且也不重视理性和逻辑。超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安德烈·布勒东认为,一个人从他性下一直到死,绝对地现实都不是逻辑、理性和事实,而是他的下意识,或是梦的幻。他认为现实本身就是梦,而幻景是现实的真实存在,是理智不能解释的,因为梦里的一切都是无法解释联系的。超现实主义并不否认文艺的真实性,只是过它要来的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梦幻的真实。布勒东给超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一种纯粹的心灵的无意识。可以借助它,用口头、文字或者任何其他的方法来表达思想的不真正性。它不受任何理性的制约,不带任何审美的或道德的偏见来限制思想。”

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介绍过来。安·布勒东写过一本散文式诗,书名叫《可溶解的鱼》。其中有这样一段妙文:“在塞一热内内排排佛山上有一条长长的野鸭吃水槽。夜幕降临后,所有在巴黎称作胆怯的野兽和奇花异草都来此观战。从最近处观察,如果你没有看到在石头上—根柔软干枯的红色干涸了。什么样的珍贵血液在这里不停地流动,而羽毛、绒毛、胎毛和粘要的水子被血流淌过后脱落了目标呢?脖子被血流冲走了头失腔后,便是为这个地方的动物和植物永留青春而献身呢?那个穿穹顶服装的圣徒使这琼浆玉液流进石头的血管呢?每晚晚上,此乳房还美的绝妙造物的女孩引得发抖。一会儿把他成千条尾巴的畜群

重新赶来。从那以后,慈姑有三只手,一只采蝶,一只抚摸,一只逗引或引导,从我们现在的慈姑到一只眼猫,一只眼狗的,萨摩斯狗,这都是我梦中浮現的狗,像海狗的真实存在”(此处借用何敬熙同志的译文)。

这就是布勒东刻画的没有逻辑没有逻辑、语义混乱的梦幻中的现实,或者说是现实的梦幻。超现实主义着意表现的不是不真实人的生活,而是理想中的人的幻景。这一点,在加塞特说得很坦率,他说“诗人在加倍止作的人的情况下开始的。”

象征主义为艺术的鼻祖之一、法国的波特莱尔是反对“复写现实”的。他说:“我认为再现任何存在的事物是没有好处的。诗人的责任,因为没有一个存在的东西能使我满意。因此丑恶的,我宁可要我所幻想的怪物,不要那些肯定能人感到厌烦的东西”。波特莱尔并不是否认客观现实是存在一种,他只是认为这种存在是丑恶的。因此他特别强调诗人的想象力。他说世上“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说的结果”,也就是说说是人的想象力的产物。所以想象力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它的驾驭者。波特莱尔所谓的“真实”仅指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现实上的真实的“真实”,是所谓诗人心灵的真实反映。

英国19世纪末叶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与波特莱尔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尽管他们的文艺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他说,波特莱尔艺术观认为是一种存在,虽然它本身是丑的;王尔德的文学法则相反,他说:“多少世纪以来,伦敦就是假,但是谁也没有见到假,对它一无所知。直到艺术创造了假,露方始存在”(按:指说出露的存在—引者)据此,他得出结论说,不是艺术表现现实,而是现实模仿艺术。最能表明王尔德这种文学思想的反倒是他的童话《快乐的王子》。对于这部唯美主义的小说的描写不应该把它一概归于假。作品中心思想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不是配有一副美好的容颜的。王尔德通过这个小小说说明的仅是:现实是痛苦的、丑恶的(例如他说:“美不真”),因为艺术是“发明”、“是想象”、“是做梦”。

根据以上十分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文艺流派不强调文艺的真实性,只是它们对真实性各有

# 关于文艺真实性问题的讨论

回忆有时候是令人痛苦的,但回忆也能够帮助人们吸取生活的营养,总结历史的教训,使得人们变得更加聪明和成熟起来。我读《破壁记》,就有这样的感觉。陈登科和肖马同志写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高篇小说,又一次把我们带进了那刚刚过去的、象梦一样的十年动乱时期。

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过:“抗日战争,不过不过!解放全国,只用了三年。”而那一场一度被称为“全面内战”的巨大战,却用去了整整十年。要在艺术上概括这近生活显然是不容易的。但两位作者却以自己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较为成功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这里有“被撕得没有骨了”的日记,有被当作修正主义分子树到果树的月亮壳的土地,有商业单位的后门以及徘徊而来的商人的骂骂咧咧,有钻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内部残害人民、鱼肉乡里的重大恶霸……而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段困而特殊的时期,同样“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义的人……”如:丁太受妻而死,仍然耿耿于人们酿造毒酒的田坂;秉性善良、敢作敢当、嬉笑怒骂不失风度的熊大嫂;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却仍然一心系祖国唇齿的爱国华侨侨民;识见坚定、宁死不屈的军事革命家;史斌,直到安、曾懂和程理这二个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对共产主义事业都怀着崇高信念的党的高级干部。作者所用的笔墨虽然多寡不等,但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使中国历史这段痛苦的经历,充满了历史的尊严。总之,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是如此广阔,工农商学兵等各各行各业,几乎都被触及到了。

将如此广阔的小小说规模的题材浓缩到一部小说中去,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作者必须找到具有相应容量的、灵活而紧凑的结构形式,在感受和评价生活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全部素材进行有效的剪裁、加工和组织。作者选择了安东作为揭示“人生之恶”的突破口和贯穿全书的人物,这是很有意义的。安东是一个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后担任了一个中等城市的地委书记。他的经历和职位,使他上可通到中央,下可深入民间同群众直接接触,这给作者提供全面题材和结构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圆筒。再从时间上看,作者主要选择了从1975年4月安东获释,到1975年10月再度下狱这段时间中间主人公的所见所闻和举动描写,作为展开故事的契机。如人们所熟悉的,这是一个重大历史光明与黑暗进行激烈搏斗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由于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就使得这段时间集中取得了特别强烈的色彩和光度。作者把故事的重心放在这一年,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感光充足的画面,也使他们对好一个合适的“焦距”:他们可以既抓住自己,又毫不浪费篇幅地将整个画面收入读者的视野。这样,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作者都找到了适度的位置 and 机会,于是,作者便采用了自

己所熟悉的电影的结构方式,一气呵成地拍摄下了那些既能互相独立,又具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镜头。正如作者在后“后记”中谈到的那样:“这很象‘一本本来有剪辑的电影胶片,印着一连串突破历史的镜头。这些镜头组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史上一段痛苦的分折’”。

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者对生活本身进行的观察、探索和研究,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对题材材料有意识的深入挖掘。小说第三章随着安东出狱后对苦闷解的一席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大多数执行任务的人,良心还没有称斤称两地卖掉!不过,我感到痛苦的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我们党内这样一批日记!”小说第八章,通过芸周面,有被当作修正主义分子树到果树的月亮壳的土地,有商业单位的后门以及徘徊而来的商人的骂骂咧咧,有钻在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内部残害人民、鱼肉乡里的重大恶霸……而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新中国历史上这段困而特殊的时期,同样“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义的人……”如:丁太受妻而死,仍然耿耿于人们酿造毒酒的田坂;秉性善良、敢作敢当、嬉笑怒骂不失风度的熊大嫂;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却仍然一心系祖国唇齿的爱国华侨侨民;识见坚定、宁死不屈的军事革命家;史斌,直到安、曾懂和程理这二个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对共产主义事业都怀着崇高信念的党的高级干部。作者所用的笔墨虽然多寡不等,但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他们,使中国历史这段痛苦的经历,充满了历史的尊严。总之,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是如此广阔,工农商学兵等各各行各业,几乎都被触及到了。

将如此广阔的小小说规模的题材浓缩到一部小说中去,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作者必须找到具有相应容量的、灵活而紧凑的结构形式,在感受和评价生活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全部素材进行有效的剪裁、加工和组织。作者选择了安东作为揭示“人生之恶”的突破口和贯穿全书的人物,这是很有意义的。安东是一个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后担任了一个中等城市的地委书记。他的经历和职位,使他上可通到中央,下可深入民间同群众直接接触,这给作者提供全面题材和结构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圆筒。再从时间上看,作者主要选择了从1975年4月安东获释,到1975年10月再度下狱这段时间中间主人公的所见所闻和举动描写,作为展开故事的契机。如人们所熟悉的,这是一个重大历史光明与黑暗进行激烈搏斗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由于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就使得这段时间集中取得了特别强烈的色彩和光度。作者把故事的重心放在这一年,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感光充足的画面,也使他们对好一个合适的“焦距”:他们可以既抓住自己,又毫不浪费篇幅地将整个画面收入读者的视野。这样,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作者都找到了适度的位置 and 机会,于是,作者便采用了自

还是描写得好的”。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还是从前那些作者容易犯的一种老毛病:超越客观条件地过分理想化了自己的英雄人物。其次,有些描写也有牵强之处,如让安东在1966年冬天还公开在大会上讲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批判了这句口号的“五一·一六”通知早已弄得铺天盖地的集中爆发,就使得这段时间取得了特别强烈的色彩和光度。作者把故事的重心放在这一年,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感光充足的画面,也使他们对好了一个合适的“焦距”:他们可以既抓住自己,又毫不浪费篇幅地将整个画面收入读者的视野。这样,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作者都找到了适度的位置 and 机会,于是,作者便采用了自

还是描写得好的”。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还是从前那些作者容易犯的一种老毛病:超越客观条件地过分理想化了自己的英雄人物。其次,有些描写也有牵强之处,如让安东在1966年冬天还公开在大会上讲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批判了这句口号的“五一·一六”通知早已弄得铺天盖地的集中爆发,就使得这段时间取得了特别强烈的色彩和光度。作者把故事的重心放在这一年,不仅使他们获得了感光充足的画面,也使他们对好了一个合适的“焦距”:他们可以既抓住自己,又毫不浪费篇幅地将整个画面收入读者的视野。这样,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作者都找到了适度的位置 and 机会,于是,作者便采用了自







